

南匯縣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南匯縣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

一九八七年四月

目 录

硕果初结 期以累累.....吕健民 (1)

开辟地下交通线.....张厚生 (3)

我的回忆.....濮振东 (9)

《南汇报》始末简述.....王梅亭 (13)

✓ 新场耶稣堂简史.....陆明达 (17)

眷恋故土爱国志 造福桑梓赤子心

——记爱国爱乡港胞王恒生先生.....顾鼎熙 (23)

上海杨氏针灸流派简介.....方厚贤 (27)

南汇报业史.....张咏虞 陈夔龙 (33)

“发外机”的创始者——唐晋昌袜厂.....张咏虞 陈夔龙

我县最早建立的群众性体育组织

——周浦商务分会绅商体育会.....周克平 (26)

清代南汇报防机构及设施.....顾燕琴 (12)

话说“鸿春楼”羊肉面.....吴锡康 (38)

编 后 语..... (52)

封 面 题 词.....唐炼百

硕果初结 期以累累

吕健民

在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的辛勤努力下，为人们关切的《南汇文史资料》（第一辑）今天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我县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的一件大喜事，特致以热烈的祝贺！

文史工作是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五九年倡导的，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史资料是当代人写当代事，是历史见证人亲历、亲见、亲闻的实录，具有翔实的资料性和可读性，同时还具有为爱国统一战线服务的鲜明政治性。文史资料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民族、宗教、侨务、社会风俗民情以及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各方面的史料都可包含。做好我县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编印工作，不仅对历史文献起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且是对人民和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不仅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充实内容，而且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上，也可起温故知新和借

鉴参考的作用。通过文史工作，还有利于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活动，对促进祖国的大统一、大团结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南汇地处大上海的东南郊，东濒大海，虽然成陆年代不很久远，但建县已今也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勤劳、勇敢、智慧的南汇人民是富有开拓精神和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他们代代相传，把数十万亩荒滩开垦成良田。他们前仆后继，一次次地反抗外敌入侵和内部的封建压迫。特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怕牺牲，英勇战斗，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在建国后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也涌现了一些值得一书的杰出人物和优异事迹。因此，南汇的史料资源也是十分丰富的。我们热诚地吁请在南汇战斗过的老前辈，全县各界人士和旅居海外的侨胞们，为《南汇文史资料》惠赐大作，让《南汇文史资料》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指导下，结出累累硕果。

开辟地下交通线

张厚生

一九四四年冬，浙东区党委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新形势，于是下达指示：要求原活动于浦东、浦南地区的淞沪支队（前身即第五支队）向主力渡浦西进。为了保证进军的安全，支队长朱亚民同志就派当时担任中共岸北区参议员兼政治指导员的孙平心同志（原名赵修心）负责筹建一条横渡黄浦江的秘密交通线。当时孙平心同志的家乡（杜北地区），已经有了一批青年去参加淞沪支队，地方上也有一部分积极分子，群众基础比较好。孙平心同志觉得承担这一任务，条件是十分有利的，于是就着手筹建。

一九四五年初的一天深夜，北风呼啸，天寒地冻，人们早已进入梦乡。孙平心同志冒着凛冽的寒风，摸黑来到我村，他按照原用的暗号有节奏地敲了我家的门（这个暗号从孙平心同志介绍我入党后开始用起的）。我闻声立即起床开门迎他进屋，不等坐下，他就轻声对我说：今晚有重要任务要商量。我便招呼他坐定，并倒了一杯开水给他烘手。接着他说：上级指示，为了适应形势和变化，急需发展沪西地区的武装力量，以贯通黄浦江两岸，连接长江三角洲，包围上海市。为此，淞沪支队的主力要渡江西进，发展青东地区的武装力量。为了保证进军的安全，必须选择一处较为隐蔽的地方，在黄浦江两岸建立一条秘密交通线。并提出要我同他一起担当这项工作。最后，孙平心同志郑重地对我说：现在我代表上级党委委派你为浦边交通站站长。

随后，孙平心同志又几次深夜来到我家，就黄浦江两岸的地理环境，敌我情况，渡口选择，人员和船只配备以及如何防止敌人的破坏等等，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和部署，务求万无一失。孙平心同志

还对我说：希望你依靠基本群众，胆大心细，沉着机智地去努力完成任务。于是我就在孙平心同志的具体帮助下迅速开始了这项工作。

首先，是渡口位置的选定。经过反复比较，最后决定把浦东的渡口选定在杜行镇以北，北口镇以南，原属北杜乡境内的沈庄塘出口处，浦西选定在塘口镇对岸的莘泾港入口处。继则又慎重选定了负责摆渡的船夫（条件是：带四五年行好漂，有摇船技术，能守口如瓶的）。先后有赵金根、王根松、王林松等人。之后又确定了向导员，浦东的向导员是吴金根，只当时是以种田兼扎纸作为业，为人富有正义，一九四四年参加抗联。原祖传两人的介绍，认识了孙平心同志。他基于职业的特点，对当地农村的大小道路了如指掌。他身强力壮，且善走夜路。于是派他为浦西（周浦至航头的沪南公路以西）至沈庄塘渡口内自设岗（后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入伍）；去浦西的向导员选派了曹火金（走乡转场匠，他在职业活动中对浦西的农村道路十分熟悉，即便在夜间行走也不会迷路，现尚健在）。他担任的向导地段自浦东沈庄塘渡口至浦西朱泾浜。（朱泾浜是个村名，位于莘庄镇西北方向，离莘庄约十华里。朱泾浜至浦东的向导员，是由浦东地区的有关组织安排的）从而初步完成了这条交通线的筹建工作。

这里顺便再说一下：孙平心同志当时小心翼翼地筹建这条交通线，他自始至终坚持安全第一。孙平心同志鉴于当时当地的情况，为了使这条交通线做到保持秘密，他故意在部队里直接间接地说成交通渡口设在杜行镇南港镇北。同时，把找人找船等事，也故意说成由杜行镇南边的人做的。（这是孙平心同志为了保密而使用的策略）所以直到现在有老同志，对于淞沪支队主力西进时渡黄浦江，一直当作是从杜行以南南港以北摆渡的，以及当作由杜行镇人负责

找人找船。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仍有一些同志对这条交通线渡口的位置和交通线上的若干工作人员还未知晓。事实是，这就是以说明当时孙平同志筹建的这条交通线是多么重要。

一九四五年二月初，就有余恒生、顾志清、肖望等同志先后进行渡江。（其中一次是在农历除夕夜即清浦镇发生大火交子到天夜里）这几次渡江由赵金有船夫负责摆渡的，由我亲自带路至沈庄摆渡口。第一次摆渡的第二天上，天气寒冷，江滩冻土坚滑，我在摸黑行走时不小心跌了一交，手被芦苇根戳破，出了些血，当时因急于完成带路任务，不觉得痛。送渡完毕，在回家途中，紧张的心情开始松懈了，就感到手掌里一阵阵疼痛。一到家里，我的爱人见我这副样子，吃了一惊，一边为我忙着包扎伤口，一边问我为什么受伤的？我只是勉强笑笑，不去正面回答她的问话。而她也就往常一样，不再追问。她对我的早出晚归，从不过问究竟。不仅如此，她还能在我深夜归家时，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她一直是我为革命工作的好帮手。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农历正月十四日），顾复生同志率部四十二人，由王根铨、王松林两位船夫负责摆渡，由曹火金向导员带路至朱泾浜。支队首次率部渡清西进，胜利完成任务，给我增添了信心和勇气，但也感到以后的责任更大，要戒骄戒躁，万无一失地做好交通工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农历二月二十三日），陈伟达、朱亚民、曾平等同志率主力三个大队向清西挺进。因为这次走大队人马，仅王根铨、王林松（王根铨的伙计）一只船是无法完成摆渡任务的。因此在事先筹划定当，及时找到了范舟宝等的两条大驳船，以及沈妙金等的大小船只共五条，从而大大加强了摆渡的力量。这次渡江因大部队行动，组织工作繁复，启渡时已经深夜，所以部队到达朱

泛渡时，天光已亮，经对列队点名后，便知五百八十五人无一掉队而安心。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冀鲁鲁同志率领一部分战士（实际人数现已记不起了），第三批接近浦西。后来知道，这支队伍还为浦西部队护送一批军械和弹药，充实了浦西部队的军需给养和战斗装备。自此，田公予明和张席珍两位同志留在浦东领导抗日战争。

以后，凡是有任务来往于浦东浦西的少数武装人员，也是在这条交通线上渡浦的。

这条交通线不仅在一九四五年初至抗日战争胜利这段时间里发挥了作用，而且在抗战胜利后我浦东大军北撤时，也是从这条交通线渡过黄浦江回去浦东的。第一批由浙东军区党委书记谭启龙同志和浦东总队司令员何克希同志带队，第二批由浙东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同志带队，第三批由浙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又碧同志带队，第四批由浙东军区参谋长刘享云同志带队，第五批由三北特务团团长王耀同志和政委黄知真同志带队。（在以上五批中，曾有一批的一部分，从杭州湾北渡后，行经岱山县至米市渡那边渡过黄浦再穿过松江县境内抵达青浦县师的，时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大军从浙东北来时，浦东路南区区委书记孔启成同志前往接应。途经奉城、头桥、鲁汇、杜行、塘口过黄浦江。我曾目睹孔启成同志于添黄昏时分还在塘口岸边繁忙奔走。其时，孙梅生在孔的领导下，也参加了这项接应工作。

这几批部队是采用白天及黄昏渡江的。参加摆渡的船只较多（其中一部分由部队直接招呼了航行于浦江的船只）。当时，孔启成同志的叔父（开杜家行航船的）为部队渡黄浦江时也出过力。匡

民党顽军当然无法弄清由该组织的这种摆渡力量，因此也就无可奈何。

从顾复生同志率部首批西进之后，浦东与青东地区之间就有了军事来往。由于需要传递，因此建立通讯路线较为迫切。于是，上级组织又要求负责此项工作，便安排了担任浦东向导员的原火金兼交通员，负责浦东一站的联络任务，在浦东负责接头的有王书根、张毛生两人（他俩是浦东泰申桥附近的人），他们两人有时也来浦东，主要任务是负责从泰申桥向北转到西河浜的终点。西河浜终点的人员叫张德忠，由张德忠处再北转的人员有冯邦左、周阿六等。浦东方向的交通员是金和荣（杜北地区人，挑担搞担的）和周四宝（原是五支队的宣传员），从而在浦东和青东之间来往信息文件包括浦东来的宣传材料和青东报等，都可以很顺利地及时传递转送。

在此期间，我发现了一些不安全的状况（主要是周四宝的行动比较露骨，结果在我军北撤后，竟被敌人杀害），就及时与孙平心同志作了汇报，并共商对策。为了防止万一，决定再开辟一条新线。于是，由孙平心同志去动员了家住周浦东面的张根香（泥水匠）和在周浦油车弄内摆成衣摊的裁缝赵阿三（赵阿三和张根香是女婿关系）为交通员。我也去动员了在塘口镇上摆小摊头的孙金根以及来往于塘口、周浦之间挑脚车的王长生（王长生是孙金根的舅兄）为交通员。从此，便组成了一条Y字形的交通线。

在这段时间里，我曾两次挫败了盘踞在召楼一带的伪军企图破坏这条交通线的阴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四五年初夏的一天晚上，有七八个身穿便衣，腰挂短枪，手持电筒的人，突然来到我的家中。他们装出一副近乎客气的样子对我说：我们是和赵铎心一起的，今晚因有任务来到这里，临走时赵铎心关照我们，住宿问题请你帮助解决。（赵入伍后就化名孙平

心，由于这些人不了解这一情况，所以他们一开口就露出了马脚。好在孙平心同志和我在筹建这条交通线时曾估计到敌人会用各种手段进行破坏。我们也考虑过随机应变的方法。所以这批人一来，我就感觉到这是他们冒我万人众来进行试探。但我不去揭穿他们的真面目，而是婉言应付，不露声色。我说：赵锋心我和他虽没有什么深交，但总是同乡人嘛！这点忙照理应该要帮的，可是以后如果被人家知道了讲出去，那我就要做难人了，所以我的意见：由我指点几处可以住的地方，由你们自己去打交道，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你们几个人一时也想不出什么难我之计，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于是我给他们指点了一两个宅院，就这样被我打发走了。

我知道，这些人来的目的，是要试探我和淞沪支队是否有联系。根据我的分析，他们是盘踞在召楼地方的伪军，一次却不清楚很可能还会来第二次，所以我又准备了另一个脱身办法。隔了几天，上次来过的人果然又来了。他们和上次一样，仍然摆出客气样子对我说：上次我们来到一带活动，在住宿问题上你帮了我们忙，这次赵锋心关东还是要请你协助。这回我在方法上早已有了准备，所以我毫不冷不热地说：你们为了抗日，东奔西走，非常辛苦。不过赵锋心常叫你们到这一带活动，我觉得有很多不便。因为象我这样的人，对各方面都不能得罪，所以正想写个信给赵锋心。但只知他在什么游击队，而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没有办法把信寄给他。既然你们和赵锋心在一起的，那就再好没有了。你们可否帮我带封信给他，希望他谨慎行事，免得我今后为难。其中有个比较瘦小一点的家伙说：可以，可以。于是我赶紧把事先写好信交给了他。我是明知他们不会也无法把信转给赵锋心的，主要是借此来使他们相信我与第四军是没有什么联系的。结果他们中了我的计，终于一无所获而去。

(下接第18页)

我的回忆

潘振东

我叫潘光星，又名振东，一九三七年帝国医疗学校毕业后，曾在上海仁济医院等单位工作，一九四一年后，到大团镇行医。一九四二年秋，经邻居张正贤介绍（当时张为地下政治指导员），为一位姓冯的同志治疗头部创伤，之后，又经张的介绍，和五支队长朱亚昆同志相识。自此，我逐步认清了当时的抗战形势和革命真理，自觉的、不怕风险的，克服种种困难，用我的专长——医学为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九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经我治疗过的革命战士有三百多人次，如：方大刚、张耀明、张正贤、曹伯夫、夏筱琳、鲍季良、杜锐等，都经我医治过。

当时，为革命战士医病，都得保密，而且都是在条件极差，环境恶劣，设备简陋，药品奇缺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有风吹草动，还得紧急应变转移、隐蔽，虽然比不上战士们的出生入死，但工作还是比较艰难的。

记得在一九四三年，张正贤同志在奉贤戚凉墩与鬼子遭遇战斗时，子弹洞穿腰背，伤势十分严重，部队通知我火速前往抢救，当时我正在吃中饭，听到这一消息，立刻放下饭碗，整理好医疗器械，背上药箱，搭船赶到目的地，当时限于条件，既不能送城镇医院，更无法送上海治疗，我只有竭尽全刀，精心治疗，经过十多天的努力，总算化险为夷，病情大有好转。考虑到我离家太久，可能引起敌特怀疑，所以我邀请张指导员到我家呈养伤调治，在回家的小船上，我俩促膝长谈，我被张的那种革命豪情和乐观主义的精神深深感动，使我增添了无限勇气 and 责任感。为革命战士治疗，感到无尚的光荣和自豪。又过了十多天可能是漏了风声，第十二日就

兵来我躲我避，幸好米已于事前从后门走避，敌人扑了一个空走了，只是虚惊一场。后天，又有一次为伤员敷好了石膏，一小时后，又遭到敌人的搜捕，同样，伤员也早已转移而幸未出事。此后，部队领导为确保伤病员的安全治疗和养伤，把医护场所安置在远离敌人据点的偏僻、冷僻的地方，而且都设在坟山屋、祠堂、破庙里西。那时为战士治疗，大多要摸黑前去，走的尽是弯弯曲曲的茅草小路，通过那坟场、古墓时阴森可怖，好在我不迷信，胆子大，更为了去治疗人民的战士而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到了这些简陋、破旧的所在，反而觉得安全可靠，没有干扰而专心一志、从容不迫的工作。我感到，这里真是我的革命战场。

在清乡时期，形势更紧张，任务更艰巨，这些偏僻的角落也失去了安全感，部队领导又想出了巧妙的办法，就是用二、三只小丝网沿作为治疗场所，既可分散，又能集中，既机动灵活，又安全可靠，有专职通讯员联络引路，一有情况，可立即转移隐蔽，人们美其名曰：“水上流动医院。”我在这种“医院”上治疗过十多个战士，他们痊愈后，都重新返回部队，继续战斗。

敌伪时期，药品、器械非常难买，而且是禁运的，当时受部队领导的重托，同时也为了自己业务上的需要，所以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先把药品等陆续运到自己家里储藏，再伺机运往浙东，以应军需。在这方面，我也总算较好的完成了任务。

一九四七年七月，方大同同志在奉贤民福乡某地突遭敌人伏击，有二同志牺牲，方也不幸弹中股骨，造成开放性骨折，当即被背离战地，萧王嘴康医生紧急抢救包扎好，立刻送至安全处，叫我去治疗。我看到这种有创口的骨折，非短期内所能痊愈，而且又不能多移动，念及当时形势险恶，为确保安全计，经向朱伯英同志说明情况，必须尽力转至沪地住院为好。之前，我则天天前往，针药兼施。

而你仍处不化脓恶化。后即设法转移到上海调治待愈。

我为革命事业贡献虽不多，但还是经常受到敌伪的监视和逮捕。在七年多时间中，我曾被捕过三次。记得第一次被捕是在一九四三年春，这是由于被住上海三队的上海人，名叫阿大的告发而突然逮捕，被连夜解南京守备队关押，经多方设法营救，用金钱买通伪官吏，才予交保释放。出狱的第二天，我又接受了上级的指示，毅然前往为伤病员工作了。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三年秋的一个黄昏，有庄某先采以借钱为名。（借去十万元），察看地形，摸清底细，在一星期后，就带领敌人把我提到宪兵队关押，罪名是把药品支援浙东部队。家里人就到处奔走，多方求援，几经周折，还是“钱能通神”而获释。就在这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海伪保安处长兼中央税警团长熊剑东到大团要捉我，于是又去上海多方设法，不惜贿赂运动官吏，方得解危无虞。第三次被捕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被坏分子向奉贤县告发后，县长奚永之会同中统特务将我拘捕，解到南四团，用老虎凳严刑逼供，我死去活来，但始终未吐真情。同时，他们还向我家里敲诈勒索。后来又把我解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受审。后经组织大力营救，我胞弟及表兄等照例用钱财多方运动，才得假释。这次前后被折磨了一百天。

在我开始为五支队伤病员治疗时，就有人向我进言，说这项工作既受苦受累，还有杀身之祸，冒这种风险何苦！当时我想患上也斗争过。但想到许多战士奋勇杀敌，有的牺牲，有的受伤，我也是个中国人，又是一个医生，岂能眼见伤病员流血如注，痛苦呻吟，生命垂危而不顾吗！再加上部队领导对我的引导和送给我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论持久战》和振奋的《百论集》等革命书籍对我的启发，使我坚定了信念，暗自立下誓言，决心不计安危，一心为党，为人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所以虽经磨难，经受酷刑而

不屈不挠，也从不因受历次被诬而化去六。钱则平等求组织上弥补分毫。

抗战期间，张鼎珍同志曾奉令专程来我家，意欲动员我参加部队工作，后因见我家庭人口多，身体也不好，故未决定。抗战胜利后，吴俊功同志明确表示，要我仍留在地方上比较有利。

解放后，我在大中砖瓦厂任厂医，一九七三年三月，朱亚民同志得知我退休后，即回信向我祝贺，信中写道：“敬祝东同志：来信收悉。首先祝贺您光荣退休。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您为我们部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党和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因腿伤复发，近年来一直在休息，最近有所好转，望释念。祝您晚年幸福。朱亚民”。这说明党和人民对我无限的关心和爱护。目前，我们新中国安定团结，繁荣富强，我的晚年确是非常幸福！

附：（此稿在征求曾伯夫同志意见后由张祖頌等根据原稿整理。）

清代南汇城防机构和设施

清代都司衙门设在北门花园弄（现22弄），弄外为辕门弄，场地广阔，沿河筑有基固石驳岸，是练兵场所。“都司”掌理全县治安和“城守”，管理城防工作。民国纪元改制为卫队，设在县衙门内，保安队驻在东门。南汇县自明代起建有方城——方形城墙。四城门上有谍楼观察敌情。城墙四周有城河浜（又叫护城河），东、西、南、北各建吊桥一座，这都是城防设施。城内东门有“靖海桥”，有平靖海潮之意；还有“文源桥”，为通往孔庙文化区之通道也。北门县衙门前有县桥，右有白虎桥，左有青龙桥，显示威振宇宙之势。目前，已改建人民路，东西一统，两旁高楼栉比，面目全非矣。

（原稿恭供稿）

《南汇报》始末简述

XXXXXXXXXXXXXXXXXXXX

王梅亭

《南汇报》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试刊一期。后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正式创刊。《南汇报》是由中共南汇县委员会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中共松江地委宣传部指导下创办的，它是中共南汇县委机关报。《南汇报》的报名，是由中共南汇县委决定的。《南汇报》三字是请当时中共江苏省宣传部长俞铭璈同志写的。

当时《南汇报》社编辑部先后有专职成员十四人，总编辑：韩致平兼。（当时是中共南汇县委宣传部长）。

副总编辑：王梅亭、裴之衍。编辑、记者先后有张猷祖、王龙标、季石松、沈久曙、于卓靖、毛耀昌、陈岳龙、范兴隆、薛梓雄。摄影美术：严承达、曹雨村。会计：胡振国等。

《南汇报》以报导本县新闻为主，还刊登国内外主要新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任务，传播科学技术、卫生、文化知识。表扬先进，也刊登批评的稿件。报上设了下列专栏：“祖国在飞跃”，反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新貌；“社论”、“短评”、“要緊話”，根据中共南汇县委提出的全县人民的大事和经济建设、农副业生产上需要大家重视的问题，就用“社论”、“要緊話”发表；“天下大事”、“话说天下大事”，刊登国际上的大事；“南汇各地”，大量刊登本县的消息；“科学与卫生”，主要针对本县实际，宣传科学技术、卫生知识；“大家谈”，采用通讯员、读者等的议论文章；“俱乐部”，刊登文艺材料、诗歌故事；“党的生活”刊登党组织的活动和党的知识；“大家画”，刊用群众的画稿；“照照镜子”刊批评文章。此外，还有“经验介绍”、“庄稼话”、“体育场”“读者来信”……等。这些专栏都分期轮换刊出，由于北县委的重视及时

宣传，发挥了党报对全县工作的指导作用，很多内容，反映了人民的寻求，党报越到了群众的喉舌作用，所以深受读者欢迎。当时不少基层组织纷纷组织读报组，开展读报活动，更好地发挥了党报的作用。

《南汇报》的发行量。从一九五六年五月创刊初期发行三千二百多份，到后来发行量高时达一万七千多份。在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创刊时，每五天出一期，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每周出二期，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起每周出三期，直至终刊号。连同试刊号共出版397期。《南汇报》头版每期是八开二版，从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起改为四开四版。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南汇报》还出了一期专刊，内容是刊登：“中共南汇县委关于苦战一月，多快好省地完成夏收夏种任务的紧急指示。”对当时县委重点抓好的工作和比较紧急的任务采取出“号外”的办法——及时向全县人民宣传。

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南汇报》出终刊号（第390号）宣布停刊。从试刊到停刊，历时三年二个月又十天。

在“终刊号”头版左下角，刊登了《南汇报》社编辑部“向大家告别——给本报读者、通讯员的一封信”。

在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南汇报》第389期上，报头（左上角）刊登了《本报停刊启事》。全文如下：

《南汇报》作为中共南汇县委的机关报，自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创刊以来到现在已有三年多时间，在这个时期里，本报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对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任务，宣传党在每个阶段的具体任务，介绍实际工作的经验、办法、树立先进、发扬先进等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这对提高觉悟、鼓舞干劲、指导工作、增长知识

等都有好处。尽管它要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不少缺点，但它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县委机关报应起的重要作用。

自本县划入上海市后，在报纸工作上起了一个新的情况。这就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本县的发行大大扩大了。它当天能到达本县各地，迅速地传达了党的政策任务，及时反映了各地群众在完成各项任务中的英雄面貌；而南汇报一周出三期，从时间上报道上都跟不上工作的需要。在这个情况下，根据增产节约的精神，如果南汇报继续存在，就显得重复和浪费了。事实上，由于形势发展，目前本报已失去了实际存在的作用。因此，中共南汇县委决定南汇报停刊。

南汇报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根据县委决定本报在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停刊。

南汇报社一九五九年六月廿七日

说明：本报各县报 已不存在停刊。

《南汇报》创刊时，南汇县属江苏省松江专署，终刊时，南汇县已划归上海市，成为上海十个郊县之一。

在《南汇报》出版的三年二个多月时间里，它忠实地记载了我国，特别是本县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事业发展的一些历史事实。

例如：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第36号南汇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开幕毛主席致开幕词的珍贵照片；刊登了中共八大开幕的消息；还全文刊登了毛主席的开幕词等党的重要历史文件。南汇报从第36号到39号连续五期，刊登了中共“八大”的消息。

又如：一九五六年七月四日第13号南汇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十六天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在六月三十日胜

~15~